

## 追本溯源：红岩精神是这样产生的

### 核心提示

■ 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

■ 红岩精神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方面——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这就是红岩精神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方位。

□本报记者 韩毅

红岩青松沐风雨，不朽精神传万世。国庆假期，24.2万人次的游客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在红色旅游中厚植家国情怀，数量较2020年增长350.3%。

“我以前是通过书本、影视作品了解红岩，这次一口气参观了红岩村、周公馆、渣滓洞、白公馆等景区，深深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上海游客刘鑫感叹。

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方位。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又因其所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走进红岩革命纪念馆二楼展厅，“千秋红岩”四个金色大字闪闪发光，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历史文物，将观者的思绪瞬间拉回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倾向日益显现。

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紧接着，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随后陆续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面临着发生逆转的危险。

面对复杂局势，中共中央领导层保持着清醒认识，坚持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白区工作方针。

因此，高举抗日民族旗帜、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历史使命。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13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组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16日，南方局向中央书记处报告领导成员分工情况并得到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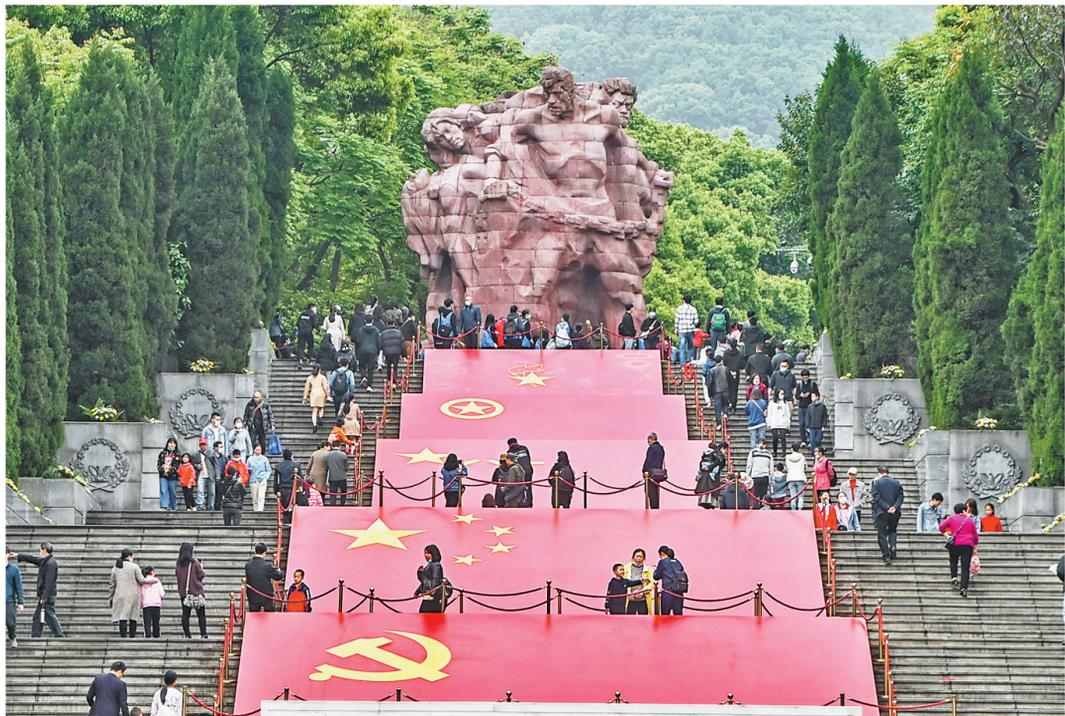
至此，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作为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南方局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重庆为依托，更加积极、主动地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1939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口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这也成为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红岩精神的首次提出，源自于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到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东迁南京，其在重庆约8年之久。

其间，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



沙坪坝区，市民前往歌乐山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4月4日摄)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10月3日摄)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5月31日，白公馆、松林坡革命文物旧址修缮竣工试开放。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 弘扬红岩精神 奋进伟大时代

□本报特约评论员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丰富的红色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并且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对红岩精神形成发展、培育主体、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为我们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弘扬红岩精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红岩，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机关所在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地。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周

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重庆涌现了大批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红岩精神是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的；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斗争中丰富和发展的；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以江竹筠、王朴、陈然等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英雄的狱中斗争中进一步锻造和凝结而成的。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凝结成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的集中

反映，内涵丰富。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红岩先辈们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应对众多难以想像的风险考验，信仰坚定、不怕牺牲，凭借的就是坚如磐石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广大中间力量团结合作，积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彰显了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战斗在国统区特殊战场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逆境险境中挺立，在危局困局中开拓，展现了红岩革命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永不叛党的江竹筠、王朴、陈然等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和各种诱惑，不折不挠、宁死不屈，弘扬了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

倒、奋勇向前。”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其他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形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进新形势下“伟大斗争”的有力思想保证，也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时俱进地继承好、弘扬好红岩精神，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用好红岩精神这个生动教材，坚定理想信念，仰承浩然正气，不断从中汲取信仰和前行的力量。

伟大事业呼唤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共产党人干事创业，靠的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继承和弘扬好红岩精神，勇担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不断谱写无愧于先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

（执笔：潘洵，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党的革命精神谱系和图书编辑出版研究专项“红岩精神研究”首席专家）

1985年10月14日，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这一概念由此传扬开来。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唱不尽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的忠贞与不屈。

走进渣滓洞监狱旧址，面对阴森的囚室、恐怖的刑具，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是什么让烈士们舍生忘死？

白公馆，位于歌乐山山腰。不远处的渣滓洞，原是一个小煤窑。后来，这两个地方都被改为监狱，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志士。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关押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人间地狱。

彼时，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她是彭咏梧之妻，长时间当彭咏梧的助手，手中掌握着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便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

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务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审讯江竹筠，百般威吓利诱，江竹筠却丝毫不为所动。

徐远举一无所获，企图用刑拷打来摧毁她的意志，给她戴重镣、坐老虎凳、电刑……江竹筠疼痛难忍，多次昏死过去，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最终，江竹筠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鈺不幸被捕。面对徐远举提出“只要签字脱离共产党就得到释放”的劝降，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没死。”就义时，他怒斥特务：“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同时大声高呼：“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然面对敌人酷刑，威武不屈，在狱中以全方多层次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解决西南事变、提出“联合政府”主张、配合重庆谈判等重大历史时刻，始终高举抗战团结民主与和平民主大旗，为争取抗战胜利、实现和平民主不遗余力，与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共同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历史画卷，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

1949年11月27日，离重庆解放只有3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的革命者实行集体大屠杀。在枪声大作、烈火熊熊的最后关头，革命志士们也不曾屈服求生，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数据显示，当天，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的许晓轩、谭沈明等213人被杀害。而此前，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超城及秘书宋绮云等6人被杀害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11月29日，城区“新世界”临时看守所中的32人被押至松林坡杀害。遭国民党反动派前后杀害的共300多人，仅有35人脱险幸存。

“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室主任黎余说。

红岩精神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方面——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这就是红岩精神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方位。

“今天，我们回首往事，红岩精神依然是座巨大的宝库，它具有丰厚的历史内涵，更具有穿越时空的实践价值。”黎余说，“我们要深刻把握红岩精神的信仰之力、道德之力、团结之力、执行之力，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鈺不幸被捕。面对徐远举提出“只要签字脱离共产党就得到释放”的劝降，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没死。”就义时，他怒斥特务：“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同时大声高呼：“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然面对敌人酷刑，威武不屈，在狱中以